

红色家书映初心 一代风范励后人

何小文 汤根娅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的展厅中有一组别致的“百年家书”：一帧用英文书写的明信片以及一封铅笔写的“家书”。明信片封面为一女话务员的圆形金边头像，下面是“恭贺新禧”四个金色隶书，封底为梅花的花瓶图案，下方为“上海大东书局精印”文字，内页为用英文书写的“MY SWEET HEART Miss lee”，落款为“CHENG BING”；书信则是在普通的白纸上用铅笔书写的竖行行书。

在烽烟弥漫的革命年代，先烈们写给家人的每一封书信都弥足珍贵，字里行间无论是家长里短还是豪情壮志，都是他们彼时内心的真情流露，也是留给后人追忆的精神寄语。而这组文物背后的故事总能让观众对其主人——红军烈士陈毅安夫妇的那份铁血柔情感慨万分。向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无偿捐献这些家书和明信片，并向大家讲述这些书信来历的便是烈士陈毅安的遗孀陈昆明。

陈毅安（1905—1930），湖南湘阴人。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秋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1927年9月，随部队参加秋收起义后上井冈山，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一团连长、营长，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累立战功，在黄洋界保卫战中大显身手。1930年6月任红三军团第八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在长沙战役中任前敌总指挥。8月7日凌晨，在掩护军团机关转移时壮烈牺牲，时年25岁。

早在1921年，陈毅安与女学生李志强相识并相恋，两人表露情意从互通书信到结为伉俪，持续近十年。除了中文书信，陈毅安还给妻子写过一张英文贺卡。这些信寄托了青年恋人相濡以沫的情感，也记述了陈毅安投身革命的心路历程。

其中有一封这样说道：“现在我进了学校，老实不客气对你不起了，也已经同别人又发生恋爱了，这个人不是我—

个人喜欢同她恋爱，世界上的人恐怕没有不钟情于她，这个人，就是列宁主义。”陈毅安把列宁主义当作自己的恋人，于是把这种信仰当作了一生的伴侣去追求。即便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血雨腥风中，陈毅安也坚守着这份信念和理想：“思前想后，除了我们努力革命，再找不出别的出路，把一切旧势力铲除，建设我们新的社会，这个时候才能实现我们真正的恋爱。”在弹雨横飞的战斗岁月中，陈毅安始终保持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我天天跑路，钱也没有用，衣也没有穿，但是精神非常的愉快，较之从前过优美生活的时代好多了。因为是自由的，绝不受任何人的压迫。”

最令人动容的是，陈毅安还写了一封一个字也没有的“无字信”。这是陈毅安牺牲一年后，战友按照他生前的嘱托，辗转从上海寄出的。因为陈毅安曾与妻子李志强有过约定：“如果我哪天不在人世了，我就会托人给你寄一封不写任何字的信去，你见了这封信，就不要再等我了。”

陈毅安壮烈牺牲的消息，李志强当时并不知道。直到7年后的1937年，国共两党宣布合作后，李志强写信给延安八路军总指挥部询问情况，收到了彭德怀的回信：“同志为革命奔走，素著功绩，不幸在1930年已阵亡，为民族解放中一大损失。”李志强孤身一人，在战争的岁月中侍奉长辈，抚养儿子，克服种种艰辛困苦继续生活。1934年她离开湖南湘阴界头铺镇，到长沙考入湖南省长途电话局，依靠微薄的薪水养活年幼的儿子和年迈的母亲，直至将陈昆明抚育成人。

自1922年起，到最后诀别的“无字书”，八年间陈毅安一共给妻子写了54封家书。这些家书寄托了一对爱侣的款款深情，承载着战火的记忆，印刻着沉甸甸的革命信念。

1955年新年来临之际，迁居北京的李志强翻出当年陈

毅安最早寄给她的那帧贺年明信片。目睹着熟悉的字体，李志强仿佛又见到了年轻俊朗的恋人，于是提笔在明信片上做了注释：“1922年元旦，毅安送我的贺年拜片，谁知我也好似拜片上的女士一样，我也学成了一位为人民服务的话务员，此片是三十年前的纪念品，真可贵也。”

2021年清明时节，江西卫视《社会传真》栏目邀请陈昆明教授及其儿子陈正烈将军等人，以讲述红色家书的方式纪念共和国第九烈士陈毅安先辈，聆听陈昆明讲述父母的“红色家书”故事：“90年前，我年龄尚小，母亲李志强就收到了这样一封无字信。顿时，原本盼望丈夫消息的满心期待变成了夺眶而出的汹涌泪水。他们生前就约定了，父亲说过，牺牲了我会告诉你一声，就是无字信表示我已经不在人间了。收到这封无字书信的时候，我母亲就放声大哭，知道他为革命已经牺牲了。”

这张无字书信和几十封家书从此成为母亲李志强一生守护的挚爱。1983年3月，李志强因病去世。1990年，陈昆明遵循母亲生前的遗嘱，千里迢迢把父亲的忠骨和母亲的骨灰合葬在了井冈山根据地烈士陵园。在儿子陈昆明的心里，父亲陈毅安是一个浪漫的人，也是一个风趣的人，更是一个忠于信仰的革命战士。

陈昆明先后把父亲写给母亲的贺卡和54封书信复印集寄给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保存。陈毅安和李志强革命爱情的见证物，就这样永远存放在了他为之战斗过、流血过的革命摇篮井冈山。不久前，陈昆明教授也因病辞世。所幸的是，观众可以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看到陈毅安等革命英烈生活、战斗的痕迹和亲笔手写的文字，在英烈后人深情的讲述中感受历史的壮烈与温情，伟大人物的精神依然在传承交汇。



《寒岩积雪图》

围炉煮茶，古人的冬日风雅

郑学富

这段时间，社交平台上兴起了一股“围炉煮茶”热。三五好友，围炉夜话，饮酒煮茶，在人间烟火中体验诗意生活。在严寒冬日围炉而坐，取暖聊天，是自古已有的娱乐活动。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寒岩积雪图》描绘的就是古人围炉煮茶的情景。

《寒岩积雪图》为绢本设色画，左下角有马远的款记，但有学者从画风判断，此画应出自明代宫廷画家钟礼之手。画面中皑皑白雪覆盖了山峰、溪岸、楼阁和树木，呈现出天地渺茫、山林幽寂的景象。庭院内古松挺拔，屋宇周围梅花绽放，为静谧的寒夜平添生机。屋内烛光微弱，二位高士相对而坐，煮茶叙谈，一童子在旁侍立。

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源远流长，古人非常讲究饮茶用具、饮茶用水和煮茶艺术。白居易《晚起》云：“暖炉生火早，寒砚裹头迟。融雪煎香茗，调酥煮乳糜。”描绘的正是冬日煮茶之情景。古人煮茶要备炉、烧炭，看顾着釜中的水微微沸出声音，再投入茶末。唐朝“茶仙”陆羽在《茶经》中有言：“其沸，如鱼目，微有声，为一沸；缘边如涌泉连珠，为二沸；腾波鼓浪，为三沸。已上水老，不可食也。”就是说煮茶“三沸”为恰到好处，煮过了会破坏茶味。

苏轼是煮茶的行家。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任团练副使已有两年。是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深夜，大雪初晴，睡梦中的苏轼用雪水煮煮最名贵的北苑贡茶“小龙团”，且有美人端茶歌舞，好不惬意，于是他兴致勃勃，饮茶吟诗，醒醒来后竟是南柯一梦。他立即把梦中残句续为两首回文诗，其一云：“空花落尽酒倾缸，日上山融雪涨江。红焙浅瓯新火活，龙团小碾斗晴窗。”用火煎茶，用新杯品饮，才能品出茶的味道。苏轼人生多舛，仕途曲折，但他生性豁达，辗转客居时与茶为友，他作于元符三年（1100）春的《汲江煎茶》曰：“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钓石取深清。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雪乳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泻时声。枯肠未易禁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诗中描写了从取水、煎茶到饮茶的全过程，也抒发了漂泊在外以茶聊以慰藉的思乡之情。

古人认为，雪凝天地之灵气，无暇至纯，是煮茶的上品之水，以柴薪烧化雪水煮茶，其味更甘冽。陆游《雪后煎茶》诗云：“雪液清甘涨井泉，自携茶灶就烹煎。一毫不复关心事，不枉人间住百年。”诗人逸兴遄飞，一边欣赏雪景，一边烹雪煎茶，抛却尘虑，豁达透明，体现了对生活的热爱和浪漫。“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生性淡泊名利，在冬日雪后的寒夜，“寒窗里，烹茶扫雪，一碗读书灯”，旷达闲适、自得其乐的生活态度跃然纸上。清代剧作家李渔，性情儒雅，喜爱雪水茶，以《煮雪》诗描述了自己煮雪烹茶的体验：“鹅毛小帚掠干泉，撮入银铛冻煎。天性自寒难得热，本来无染莫教煎。比初虽减三分白，过后应输一味鲜。更喜轻烟浮竹杪，鹏飞不避似相怜。”

若取花瓣上的雪或未落地之雪，化水煮茶，更为风雅。清代学者震钧尤喜饮茶，在《茶说》中写：“雪水味清，然有土气，以洁瓮储之，经年始可饮。”《红楼梦》中写妙玉煮茶就达到了这种境界，她在玄墓蟠香寺收梅花雪，装在鬼脸青的花瓮里，埋在地下五年，还须有黛玉这般清雅妙人，方可开封取雪煮茶。宝玉细细品过后，自觉清茶有味，还有淡淡花香，赞赏不绝。

围炉煮茶之所以能在如今流行，这与人们衣食无忧之余追求生活品质、复兴传统文化有关。在古色古香的氛围里，使用传统的茶具烹煮中式茶饮，再搭配柿子、红薯、砂糖橘、花生等零食，忘却忧愁烦恼与亲友聊天叙旧，于忙碌中“偷得浮生半日闲”，正是延续古风的一桩雅事。



几种民国时期纸币赏析

彭远汉 朱新昌

我国是世界历史上发行纸币种类最多的国家，仅民国时期发行的官方纸币就达3000种以上。民国时期，由于社会动荡不安，纸币管理极其混乱，新旧纸币交错并存，中央政府、地方政权、私人以及外商发行的各类纸币同时流通。其种类包括军用票、关金券、金圆券、银圆券、铜圆券、法币、商业银行与特种银行票及各省地方金融机构发行的纸券等不同类型。因此特收集了几种不同时期的民国纸币样式，以供赏析。

中华民国金圆券（图1），即中华民国金圆券，是孙中山1911年5月在美国旧金山成立“中华革命军筹餉局”并印刷发行的一组名为“中华民国金圆”的革命军筹餉券。孙中山亲自参与设计，李公侠负责印刷。“中华民国金圆”是孙中山海外筹集起义经费时发放的筹款凭证，也是众多海外华侨支持辛亥革命的历史史料。

民国时期的美钞版关金券（图2），全称为“海关金单位兑换券”，简称“关金”。1930年1月，南京国民政府规定海关进口税改用金单位代替海关两，时值0.601866克纯金，等于0.4美元。图为民国十九年（1930）中央银行美钞版关金券上海壹圆、伍圆、拾圆、贰拾圆、伍拾圆、壹佰圆样票各一枚，计六枚，均加盖“SPECIMEN”字样并打孔，但实际征税时并不接受各圆金币，而是由纳税人支付关金券。

1935年11月4日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政策，规定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后增加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图3），禁止银圆在市面流通，并限令各金融机构和民间储藏的白银、银圆交由中央银行收兑。单这次“白银国有”，国民政府即取得白银收入约计三亿元以上。同时规定法币汇价为一元，等于英镑一先令二便士半，由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家无限制买卖外汇。1937年抗

日战争爆发，“八一三”淞沪战起，外汇大量外逃，国民党政府为了防止外汇套购，开始实行外汇统制政策，废止无限制买卖外汇办法。从此，法币对内既不能兑换银圆，对外又不能自由买卖外汇，成为了一种纯纸币本位货币。

中央储备银行，简称“伪中储行”，是日军伪政府所建立的银行，发行货币中央储备银行国币券（图4）主要在日军占领区使用。到1945年8月中旬止，伪中储行共计发行伪中储券24917亿元，但到9月份则上升到了46618亿元。一个月计增发21701亿元，一方面是因为汪伪机构在日本投降前后趁机大发所谓“遣散费”，如伪中储行发行局一家即发给员工遣散费达193.61亿元。但大部分是由国民政府发行的，用途为收编汪伪和平军扩充实力，其次则用于国民党党政机关迁回南京的费用。第三是为了恢复“光复区”生产，以中储券大量贷给各类企业达1517亿元。第四则是为了抢购黄金，计支出中储券1479亿余元。1945年10月28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公布了《伪中央储备银行钞票收换办法》，规定伪中储券200元换法币1元，期限为1945年11月1日至1946年3月31日止，逾期作废。

抗日战争胜利后，解放战争爆发，国民政府军费急剧增加，财政赤字直线上升。为了支付军费大量印刷法币，导致物价疯狂上涨，国民党统治区社会经济面临崩溃。1948年通货膨胀达恶性时期，法币急剧贬值，为挽救其财政经济危机，维持日益扩大的内战军费开支，决定废弃法币，改发金圆券（图5）。1948年8月18日，国民政府下令实行币制改革，以金圆券取代法币，强制将黄金、白银和外币兑换为金圆券。但由于滥发造成恶性通货膨胀，致使大量城市中产阶级因此破产，民心大失，也成为国民党迅速失败的原因之一。



图1



图2 上至下：图3—图5



图1 河南济源汉墓出土灰陶烧烤炉

汉代的烧烤炉和烧烤食品

夏志峰

从各地出土的烤炉实物看，多数器型偏小，高在10~20厘米之间，长方形烤炉长20厘米左右，宽15~20厘米上下；方形和圆形的烤炉边长或直径20厘米左右。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长方形烤炉和西安出土的“弘农官”炉要比常见烤炉的形制大一倍以上，算是烤炉中的大件物品。

汉代烧烤所用的钎子有竹、木、铁三种。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曾出土过烤鱼的竹烤钎，即《齐民要术》所说的“竹鼎”；宁夏中卫常乐汉墓出土的烤肉串实物也是以当地出产的红柳木为烤钎；广州南越王墓有两个烤炉上放置十数支铁钎，应是文献上所记载的“铁鼎”。唐释玄奘《一切经音义》卷三：“铁鼎，谓以签贯肉炙之者也。”广州南越王墓还出土过Y形铁叉和二齿铁叉，多地汉墓出土的陶灶上印有Y形叉图案，江苏铜山庖厨画像石上的烤肉者手持Y形叉，河南洛阳烧沟汉墓壁画中的烤肉者也持着Y形长叉，甘肃嘉峪关魏晋壁画上也可见到串着肉块的Y形和三齿叉。这类叉即应《齐民要术》所说的“两歧箸”。

汉代的烧烤食品有昆虫、野生小动物和饲养动物。蝉、鸟雀（如麻雀、鹌鹑之类）和鱼类水产品，因体内有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脂肪和多种维生素，可以为人体提供丰富的营养成分且廉价易得，故成为汉代烧烤食品的主要种类，其中又以炙鱼最为常见。《国语·楚语上》：“土有豚犬之羹，庶人有鱼炙之荐”。《史记·吴太伯世家》：“使诸置匕首于炙鱼之中”。《东观汉记》卷一：“帝幸邓禹等击王郎，樨野将军刘奉，大破之，还过邓禹营，禹进炙炙鱼，帝大餐嚼。”可见炙鱼是所有阶层都可消费的烧烤食品。

汉代上层社会的烧烤食品种类就丰富多了。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遣册记录了牛炙、牛肋炙、牛乘炙、犬肋炙、犬肝炙、豕炙、鹿炙、鸡炙等多种烧烤食品；湖南沅陵吴阳墓也出土了遣册“美食方”，中有“狗干炙方”“鸚脩炙方”等几种烤炙食品。有研究者根据现有的资料以汉代无炙羊，但据《晋书·王尼传》：“与尼炙羊饮酒，醉饱而去”，知汉代也应有炙羊。根据中山大学地质系对南越王墓出土动物遗骸的鉴定结果，作为烧烤食材的动物有黄牛、猪、山羊、鸡、禾花雀、

竹鼠、水鱼、花龟、黄鱼、广东鲂、虾、青蛙、河蚬、鲤鱼等近20种，数量上以海产贝类为最多。

在烧烤之前，还要对食材进行调味。据《齐民要术》的记载，当时调味佐料有葱、姜、蒜、橘皮、胡芹、椒、盐和醋。《玉篇》：“鼈，菜菜也，俗作鼈”，鼈即野蒜、野韭。还有人工加工的佐料如瓜蒌、酸瓜、菹笋、醋、大豆酢、细作酢、鱼酱汁、豉汁和酒。也有在烧烤中调味者，山东诸城京台东汉孙琮墓出土的庖厨陶瓦纹饰记录了烧烤全过程，画面共有9人为烤串忙碌，其中切生肉块者3人，传送生肉块者1人，串生肉串者2人，烤肉串者1人，传送烤熟肉串者1人，还有1人蹲在炉边似也在烤串，画面并无无调味的环节，可能是烤串中加入调料。晋司马彪《续汉书》：“天竺国出石蜜、胡椒、黑盐。”汉时这些调味佐料可能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无须事先炮制，烧烤过程中洒在烤肉表面即可。

烧烤的木炭有桑炭和栎炭两种。张家山汉简《奏谏书》：“臣有诊炙肉具，桑炭甚美，铁炉甚馨。”桑树的分布地域并不广，产量有限，更多的应是栎炭。栎树的分布范围十分广泛，且坚固耐腐蚀，持久耐烧火温高。据中国林业科学院的检测报告，湖北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木炭正是栎炭。

汉代的烧烤应是从前代继承而来，并非域外人。汉贾谊《新书·匈奴》：“匈奴之使至者，若大降者也，大众之所聚也，上必有所召赐食焉，饭物故四五，盛美臧膾炙肉，具醢醢方尺寸于前，令人坐此，胡人欲观者固百数，在旁得赐者之喜也，且笑且饭，味皆所嗜。”可见匈奴是没有这些烧烤食品的。湖北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铜烤盘，上为圆底铜盘，下出浅盘状三足铜炉，底部分布大小不等的长条形镂空，出土时盘内有鲫鱼骨，炉内有十几块木炭，炉底有烟痕，显示烧烤器具。江西靖安春秋墓出土的“徐王义楚”炉盘，河南新郑郑公大墓出土的“王子婴次”燎炉、河南淅川下寺楚墓出土的镂空短纹铜组，可能都是当时的烧烤器具。《诗经·小雅·瓠叶》“有兔斯首，炮之燔之”“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又《楚茨》“执爓蹇蹇，为俎孔硕，或燔或炙”。这些古老的歌谣表明，烧烤在中国至少有三千年历史了。